



马克思“巴黎手稿” 再研究

Further Study of Marx's "Paris Manuscripts"

刘秀萍 著



马克思“巴黎手稿” 再研究

Further Study of Marx's "Paris Manuscripts"

刘秀萍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巴黎手稿”再研究/刘秀萍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300-18184-4

I. ①马… II. ①刘…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③“巴黎手稿”-马克思著作研究 IV. ①A811.5②F0-0③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8098 号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马克思“巴黎手稿”再研究
刘秀萍 著
Makesi Bali Shougao Zai Yanji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5 mm×23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17 插页 2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82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导论 “巴黎手稿”再研究：一个“路线图”	1
第一章 错综复杂的文献学问题	8
一、“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活动和著述	9
二、“巴黎手稿”与“巴黎笔记”的关系	15
三、“三个笔记本”与“穆勒评注”的次序	26
四、“原始顺序版”与“逻辑编排版”的差异	32
五、“三个笔记本”中笔记本Ⅱ内容探佚	42
第二章 现实中的异化与“劳动异化论”	50
一、工资与工人的生活境遇	51
二、利润与资本的秘密	59
三、地租与地产的特殊性	66
四、“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及其本质	73
第三章 异化观的发展：“社会关系异化论”	83
一、作为“巴黎手稿”特殊文本的“穆勒评注”	84
二、关于《生产》和《分配》的摘录	87
三、货币和信贷：人的“异己的”中介	92
四、交换与分工：人的“异化的”类活动	105
五、多重社会关系异化的图谱	114
第四章 异化的根源：私有财产问题	120
一、私有财产的起源及普遍本质	120

二、“对财产的排除的劳动”与“对劳动的排除的资本”	127
三、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与“矛盾”	134
四、“需要”的道德评判及其本质	140
第五章 异化的“积极扬弃”：共产主义	147
一、对各种共产主义学说的考察	148
二、共产主义的价值归旨	152
三、实现共产主义价值归旨的现实途径	159
四、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	168
第六章 异化观的变革：超越黑格尔哲学	175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态度	176
二、《精神现象学》中的“异化”和“扬弃”	182
三、黑格尔哲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190
四、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汲取和超越	200
综论 “巴黎手稿”的思想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209
一、“巴黎手稿”与《资本论》的关系	211
二、“巴黎手稿”与20世纪的异化批判	218
三、“巴黎手稿”与现时代	229
参考文献	237
人名索引	251
书目、期刊索引	253
主题索引	255
后记	264

导论 “巴黎手稿”^① 再研究：一个“路线图”

在马克思所撰写的卷帙浩繁的文本中，像 1932 年首次公开问世并被冠名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未完成的著述这样引发了对马克思思想的完全不同的解释思路、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进而形成了两极化评价的情形是很少的。众所周知，声势浩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异化和人道主义”论争都与其紧密相关。然而，喧哗之后再沉静下来思考，我们便会发现，无论是对这部著述高度重视故而对其中思想格外垂青者，还是无视这部著作的创新之处乃至肆意贬低其地位者，都遵循着同样的思考方式和言说路径：从既有的思想构架和政治立场出发，根据由当时的现实状况而生发、概括出的观点，到马克思的著述中去寻找论据的支持或阙失、差池，然后又借助这些论据来强化自己的观点、思想、理论和策略。换言之，他们讨论这部著作的着眼点其实并不是文本本身，以及从中体现出的作为马克思一生思想演进历程中特定阶段的思考，而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斯大林模式”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强烈不满。因此，尽管他们对马克思思想做出的阐释不同、评价迥异，但两极相通，都不可能是在对马克思文本做全面而精深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公允而客观的见解和理性化的分析。

权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陆续出版以及相关研究文献的发表，还有经过译文校订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问世，使我们可以站在世界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以这些权威、完整和准确的文献资料、版本为依据，尽可

① 由于“巴黎手稿”、“巴黎笔记”、“穆勒评注”等都是后人对马克思“巴黎时期”不同形式的笔记或著述的称谓，而不是他自己拟定的作品名称，所以我们在本书中用引号（“”）来标注；但鉴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经约定俗成为一本普遍知晓的书，且有单行本问世，所以我们仍用书名号（《》）标注。

能地淡化功利性，重新研究马克思的原始文本，廓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80年来争论的那些众多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估价和考量马克思著述及其思想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当然，当代哲学思维水准的提升、社会实践的发展、学者们在马克思著述及其思想研究方面的不断努力，都我们的工作提供了研究空间、动力支持、文献基础和宽阔视野。因此，重新把包括“巴黎手稿”在内的著述作为文本个案来进行深度研究，既有必要性更有可能性。本书就是为此而做的努力。

谨将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学术观点概述如下：

第一章 错综复杂的文献学问题。

显然，要全面而客观地解读“巴黎手稿”，就必须要以弄清楚马克思当时理论活动的实际情形和这一文本写作的原始状况为前提。因此，在展开对“巴黎手稿”内容的详尽解读和思想的深度阐释之前，我们先讨论其一系列复杂的文献学问题。计有：马克思在“巴黎时期”的活动和著述情况是怎样的？为什么有的著述叫“巴黎笔记”、有的则被称为“巴黎手稿”？二者区分的依据何在？它们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在“巴黎手稿”中，“三个笔记本”与“穆勒评注”的写作次序如何？不同的排序会影响对马克思思想逻辑的把握吗？“三个笔记本”的“逻辑编排版”和“原始顺序版”又是怎样的一番情况？笔记本Ⅱ大量遗失的部分，应该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将根据权威的文献材料并结合自己的判断和推理对以上问题一一做出厘清和分析。

与过去学界通常的理解有所不同，我们根据马克思写作方式的不同和思想表述的差异将其在“巴黎时期”的著述分为两类：一类是马克思对同时代人以及前人著作的摘录和抄写，其中几乎没有他个人观点的详尽阐发，或者只有寥寥数语评论或批注，我们将之称为“巴黎笔记”；另一类是其中有着马克思自己大量的正面阐述和思想论证的部分，或者即便由他人的议题引发，但马克思个人的议论却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我们把它称为“巴黎手稿”。以此为根据，“巴黎手稿”就应该包括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笔记本”和《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简称“穆勒评注”）。这与多年来学界流行的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同于“巴黎手稿”，而把“穆勒评注”归入“巴黎笔记”的做法是有差别的。我们认为，这样一种“关联”（即把“穆勒评注”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归为一类，并统称为“巴黎手稿”）和“区分”（即把正面阐述和论证马克思思想的“巴黎手稿”与主要摘录和抄写

他人著述的“巴黎笔记”相区别)，将更有助于客观地把握当时刚刚由对“副本”的批判转向对“原本”的批判的马克思思想的原始状况、研究进展和走向。

文献疏证是必要的，但对于文本研究来说，这还只是一种前提性的工作，下一步更为重要的任务是对文本内容的释读。“巴黎手稿”内容释读的难度在于，由于它尚处于草稿状态，其思想观点的明确性、论述思路的层次性和论证逻辑的一致性等诸多方面都与那些成型和定稿的文本有很大差别，这逼迫我们不得不在别人提出的议题与属于马克思的卓见之间、在思想的深刻与表达的欠缺之间、在重要观点的语焉不详与同义反复之间、在阐释思路的中断与逻辑的自洽之间做出甄别、分析、接续和抽象。可以说，在马克思众多的文本中，“巴黎手稿”的思想是最难复述和概括的，这也可能是它引起人们反复讨论的原因之一。我们认为，内容释读不仅要阐明其思想和观点，更要把握马克思论证这些思想和观点的前后思路 and 一贯逻辑。

第二章 现实中的异化与“劳动异化论”。

在整个“巴黎时期”，异化既是马克思观察到的社会现实，也是他思考和分析这种现实及其历史发展的方式和角度。受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启发，马克思早期在未完成的手稿中就使用过“异化”概念。而到“巴黎时期”他把哲学的“异化”概念引入到了对经济学问题的讨论中，揭示了经济范畴和经济关系的“属人”本质以及现实生活中与这种本质相矛盾的状况，与此同时他也把经济学的“劳动”概念引入了哲学，揭示了人的历史的和实践的本质，这显示出在他那个时候的研究中哲学与经济学的汇合与融通。

在“巴黎手稿”笔记本I中，马克思首先揭露和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及其所映现的三类人的不同的生活境况和命运，以此来揭示资本的本质和秘密，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批判了国民政治经济学家的主张。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异化劳动”的理论。可以说，“巴黎时期”马克思的异化观完全超出了思想史、哲学史的范围，并超越了黑格尔式的受“绝对理念”主宰的和费尔巴哈那种“人本学”意义上的异化观，而成为了他适当地介入社会现实独特方式，这是他对资本主义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思考的努力和尝试。马克思从人们的“收入形式”入手对社会问题进行讨论的思路虽然来自国民经济学，但不同之处在于，他借此展开的论证和得出的结论却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突破和

超越。

第三章 异化观的发展：“社会关系异化论”。

长期以来，马克思“巴黎时期”的思想主旨被学术界用“劳动异化论”来概括，很显然，这仅仅是依据这一时期的笔记本 I 的内容来立论的，而如果把马克思同时写作的、其中有他自己观点的大量表述和思想阐发的“穆勒评注”贯通起来考察，就会发现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理论视界和立论范围要大得多，也复杂和深邃得多，只用“劳动异化论”来概括并不全面。无论在“穆勒评注”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三个笔记本写作次序的问题上学者们的考证有多么大的分歧，但共同的认识是：“巴黎笔记”与“巴黎手稿”是交叉写作的，“穆勒评注”和三个笔记本的内容几乎可以说是紧密相关、逻辑上一以贯之的，只有把二者统摄起来才能展现马克思当时的思想全貌与理论的深度。而且，就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通过对穆勒经济学著作中某些概念和议题的讨论来阐发他渐趋成型的思考来讲，把它归为正面表述其观点的“巴黎手稿”要比把它混同于其它专门摘录其他人著述的“巴黎笔记”中更有助于确切地把握他思想的复杂性和变迁。

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我们在前章论述异化问题的引入与“劳动异化论”的基础上，接着讨论马克思异化观的发展，即“穆勒评注”所阐发的“社会关系异化论”。由于“巴黎手稿”笔记本 III 中也涉及到相关问题，所以也将相关的部分挪到本章来讨论。我们结合穆勒原书的内容、结合该书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以及当时马克思所关注的问题来探究：作为“巴黎时期”特殊文本之一的“穆勒评注”写法何以如此特别？而在“论交换”和“论消费”部分马克思具体分析货币的本质、信用业的出现、私有制基础上的交换和分工等问题的用意何在？他的思路是不是存在由“劳动的异化”到多重“社会关系的异化”的扩展？

无论如何，从“劳动异化论”到“社会关系异化论”，使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认识的深化。他由穆勒原书中的议题延伸出来的分析不仅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同时也是他本人当时思想发展的真实记录。可以说，如果跳过“社会关系异化论”，那么马克思在之后思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建构，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发的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尤其是《资本论》力图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示“资本的秘密”以及超越资本的逻辑等就缺乏明显的过渡，思想史的线索就缺少了必要的一个环节。

第四章 异化的根源：私有财产问题。

对于马克思来说，对私有财产的理解是其进行资本批判的基础与前提。在长达四十余年的理论探索中，他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渐次达至深邃；而这又与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始阶段的“巴黎时期”所展开的思考和奠定的基础是密切相关的。刚刚由对现代社会的“副本”批判转入“原本”批判的马克思，无论是对工资及工人生活境遇的考察、对利润及资本的秘密的揭示、对地租及地产特殊性的探究，还是对货币与信贷、分工与交换等问题的讨论，乃至对异化及作为异化扬弃的共产主义的思考，都是基于私有财产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社会形式来展开的。因此，在整个“巴黎笔记”中都贯穿着马克思对私有财产问题的思考、都或多或少有着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阐释。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之间的因果关系致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得以被阐明了。

我们把“巴黎手稿”有关私有财产的论述进行详尽的梳理，发现马克思既研究了私有财产的起源及普遍本质、区分了“对财产的排除的劳动”与“对劳动的排除的资本”，也剖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与“矛盾”、探讨了“需要”的道德评判及其本质。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私有财产问题的思考是复杂的、深刻的，但也是散乱的、在进行中的、不系统的。马克思探索私有财产的轨迹，实际上也是他一生中思想不断获得进展、补充、修正和发展的过程。换言之，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建树都与其在“巴黎时期”所展开的思考和奠定的基础密切相关。因此，反思过去我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中，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有关异化、异化对人的本质的否定以及如何扬弃异化这些问题上面，而对其中有关私有财产关系的考察鲜有足够细致的辨析和分析，不能不说是失偏颇的和不到位的。

第五章 异化的“积极扬弃”：共产主义。

私有制和异化劳动，共同促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尖锐对立。要解决社会矛盾，让工人脱离异化的困境，使社会跳出普遍奴役的藩篱，就必须扬弃私有财产。这样，马克思在阐明了异化和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之后，又为私有制社会寻找到一条现实的变革之路。他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马克思考察、比较和批判了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和学说，以他独特的“与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提出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见解，并基于自己的“人学”思想阐释了共产主义实现人的本质、使人性复归的价值归旨，又着眼于“人的现实

的实践活动”指出了以“人的感觉”的实现为特征的共产主义价值归旨的实现途径。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期许：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①。

第六章 异化观的变革：超越黑格尔哲学。

应该说，上述几个部分的逻辑是紧密衔接和非常顺达的，但文本中出现的一个特殊部分，即在笔记本Ⅲ中插入的、被编者标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一节，使问题复杂化了。从篇幅上看，现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译成中文约10万余字，而这部分就有2万字，这表明对此我们不能等闲视之；而从逻辑上说，至少在表面上这部分与其它部分确实是不关联的，插在中间有点突兀。鉴于此，曾经有论者主张将其独立出来并视为马克思另外独立的著述，且将其命名为《关于黑格尔的提纲》，以与此后不久写在由马克思标明的“1844—1847”年笔记中、但后来被恩格斯单独撷取出来并命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相衔接和呼应。然而，我们认为，“独立”云云不过是研究者的主观设想，参照“原始顺序版”就会发现，“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本来就是由笔记本Ⅲ的多个编辑文本中的内容组合而成，它们的页码与笔记本Ⅲ的其它内容的页码都是先后连接的，而撰写者又没有将其分割开的明确表示，所以，人为的、没有文本根据的分割只能使得本来完整的思想形成割裂。那么，需要解释清楚的重要问题就是：谈异化劳动为什么一定要牵扯到黑格尔哲学及其体系呢？

表面上看来，马克思是受到费尔巴哈“宗教异化观”的强烈影响而提出“劳动异化论”的，而究其实，在他的思考和阐释中插入对黑格尔哲学的分析，才体现出其根本用心。就是说，他的观点与费尔巴哈观点之间的不同，绝不仅仅只是将“宗教”易为“劳动”而已，同样使用了“异化”一词，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观”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则是由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构成及其各要素之间的过渡与转换所给他的启发而造成的。因此，他才说：“在这一部分，为了便于理解和论证，对黑格尔的整个辩证法，特别是《精神现象学》和《逻辑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学》中有关辩证法的叙述，以及最后对现代批判运动同黑格尔的关系略作说明，也许是适当的。”^①如此说来，这一部分不是“节外生枝”或者“画蛇添足”，而是马克思阐发他独特的异化思想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在释读内容和梳理思路后，还需从总体上对文本所关涉的重要问题从总体上进行评论和定位。本书最后部分从以下维度确立了“巴黎手稿”的思想史价值与现实意义。首先，“巴黎手稿”与《资本论》的关系。“巴黎手稿”可以说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最早的基础性工作。这样一部旨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的经济结构的巨著，必然要求系统地研究、批判地继承前人和同时代思想家的优秀成果，并在批判和分析中逐步形成自己对关涉到的那些重大问题的独立见解；而包括“巴黎手稿”在内的一大批笔记和著述就成为马克思日后正式创作《资本论》必不可少的理论准备。其次，“巴黎手稿”与20世纪的异化批判。“巴黎手稿”中所阐发的马克思的异化观对其思想的后继者影响至巨。这一手稿中的“三个笔记本”自1932年发表以来引发了声势浩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受到20世纪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不论是赞同者还是质疑者都很重视这一文本。有些看法或许已经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思想意旨，但也不妨被视为是从另外的视角和方向显现出“巴黎手稿”的深远影响。最后，当代社会发展所呈现的更为复杂的异化现象，一方面显示了“巴黎手稿”的前瞻性和超越性，另一方面又昭示出在其基点上进一步理论探究和现实关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97页。

第一章 错综复杂的文献学问题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手稿写作的时间长达四十余年，而其旅居“巴黎时期”（从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的著述是在这一漫长的思想之旅中竖立的第一块界碑。由于处于哲学思想的探索、变革过程当中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马克思写作和留存下来的是谜一样的文稿和笔记。如果不对马克思当时的活动情况进行考察和梳理、不对这些文献材料的写作过程和原始情形作出考证和甄别，而仅仅根据别人编辑而成的文本对其内容进行抽象的解读和发挥，进而作出概括和评论，是不可能客观而完整地把握马克思当时的理论视域、思想状况、论证方式和观念变迁的。换言之，研究“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必须考虑到当时的各种情况及马克思著述的实际情形，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片面与狭隘。

反思过去我们对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可以说这一方面的教训相当深刻。在西方，1932年由于三个笔记本首次发表，引发了把马克思思想单纯做“人本主义化”解释，进而形成影响深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1983年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出现了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论争。现在看来，这些重大的理论事件具有双重的效应：一方面它们确实吸引了更多的论者关注这一文本，从而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过于功利的“现实”考量，再加上原始文献资料的欠缺，使当时对马克思复杂思想的理解在全面性、客观性等方面又不同程度地打了折扣，很多地方有待完善和提高，从“文本学”角度考虑甚至仍有一些工作尚未展开。这是我们重新研究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内的整个“巴黎手稿”最基本的考虑。

这样，在展开对“巴黎手稿”内容的详尽解读和思想的深度阐释之前，本章先讨论其一系列复杂的文献学问题。计有：“巴黎时期”马克思

的活动和著述情况是怎样的？为什么有的著述叫“巴黎笔记”、有的则称为“巴黎手稿”？二者区分的依据何在？它们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在“巴黎手稿”中，“三个笔记本”与“穆勒评注”写作次序如何？不同的排序会影响对马克思思想逻辑的把握吗？“三个笔记本”的“逻辑编排版”和“原始顺序版”又是怎样的一番情况？笔记本Ⅱ大量遗失的部分，应该有哪些内容呢？这里谨根据权威的文献材料并结合作者的判断和推理对以上问题一一作出厘清和分析。

一、“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活动和著述

任何理论的创立都有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理论创立者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它构成理论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另一是已有的思想材料，它是理论得以建构的学术基础。“巴黎手稿”亦如此。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所面对的社会问题、他的生活境遇、他所接触到的人和思想、他所从事过的活动，都是他创作“巴黎手稿”不可或缺的背景和资料，因而也是我们研究“巴黎手稿”必须要首先关注的内容。

1843年10月底，在因“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退出《莱茵报》编辑部、辞去该报编辑7个月之后，马克思和新婚妻子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迁居巴黎，居住在位于塞纳河左岸市区的瓦诺街38号。我们所说的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巴黎时期”就是指从此时到1845年2月初他移居布鲁塞尔之前这段大约15个月的日子。这一时期对于马克思一生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直接接触

按照阿·卢格的说法，当时广阔的巴黎谷地是“新世界的入口”、“新欧洲的摇篮，又是塑造世界历史的巨大实验室”^①。年轻的马克思来到这个崭新的天地里，与此前在“《莱茵报》时期”深受“苦恼的疑问”的纠缠因而备感郁闷相比，他踌躇满志，干劲倍增，不仅要创办新的期刊《德法年鉴》，实现自己“自由地发表自己的作品”的夙愿，而且力图完成他一生中重要的观念变革、学术转向和思想建构。在这段时间里，他一方面

^① A. Ruge, *Briefwechsel und Tageblätter*, ed. P. Nerrlich, Berlin, 1886, S. 290.

利用巴黎作为当时世界社会运动中心的优势，积极投身巴黎的社会实践，获得了对各种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感性的、直接的认识；另一方面，由于他来自德国、对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辨哲学有深刻了解并开始深入反思，因此，在对法国社会运动的考察中，他又力主把法国的“心脏”和德国的“头脑”结合起来，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理性的思考。

当时法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超过德国，1789年和1830年发生的社会革命使得法国资产阶级战胜了专制制度和封建贵族而取得了政权。然而，资产阶级领导层却是由银行家、交易所大王等所谓金融贵族和铁路、煤铁矿、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与他们利益相关的大土地所有者所构成的一个集团。他们把国家政权当作了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而力图把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排除于国家管理之外。这样的结果必然是，迫使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化”了的小手工业者和中产阶级日益积极地起来反对他们。在实际的斗争中，无产阶级不仅逐渐具有了明确的阶级意识，而且渐趋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

在巴黎的马克思不仅切身感受到了革命的传统，而且有了直接接触无产阶级的机会。大约从1844年4月开始，马克思同被流放到巴黎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创立的秘密社团组织“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 and 成员有了交往，同时他也接触了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① 据普鲁士国家档案的资料记载，在1844年5月到1845年1月底，马克思经常出席巴黎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在宝座门文桑街举行的公开集会。关于集会的情况，警察局的一份报告里是这样描述的：每个星期日“常常有三十，一百或二百名德国共产主义者”在宝座门外由他们租下来的一个酒商的一所房子里集会。他们发表演说，公开宣传杀死国王，废除一切财产，惩办富人，等等。“几个阴谋家”在那里把那些贫苦的德国手工业者“引入歧途”，他们试图“不仅把工人，而且还把年轻的商人、商业代理人等等拉入共产主义运动”^②。

除了同激进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外，马克思同民主主义运动也有接触。例如在1844年3月23日，

^① 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团体，但他在居住巴黎的整个时期都和这些组织保持着联系。

^② 《普鲁士国家档案·内务部》，Rep. 77, D10号。转引自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Ⅱ），12页，北京，三联书店，1965。

他同卢格、贝尔奈斯、李宾特罗普、巴枯宁、格·米·托尔斯泰、波特金、勒鲁、路易·勃朗、皮阿和舍耳歇等人一道出席了讨论民主宣传问题的“国际民主宴会”；在1844年7月底，他又同在巴黎出版的德文报纸《前进报》的撰稿人魏尔、贝尔奈斯、亨·伯恩施坦等人密切来往，因有感于该报的民主主义倾向，他从这年的8月开始到年底，即到该报被封闭时为止，都为这个报纸撰稿，并愈来愈积极地参加该报的编辑工作。

（二）“思想交往”的新空间

巴黎不仅为马克思提供了直接接触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机会，这个被誉为“思想的弹药库”的地方还为他拓展了了解各种先进思想和思想者的新空间。在巴黎的短短15个月的时间里，除了作为工人运动组织的领导人和民主主义者以外，先后和马克思有过私人交往的不同领域的思想家和社会名流有：海涅、伯爵亚·采什科夫斯基、海尔维格、科伦的罗兰·丹尼尔斯、荣克、蒲鲁东、《前进报》撰稿人格·维贝尔（医生）、巴枯宁、威·魏特林、卡尔·格律恩、亨利希·毕尔格尔斯、路易·勃朗、卡贝，等等。

在这些人当中，很多都同马克思有过长时间的、密切的合作。比如，著名诗人海涅是马克思在1843年12月底通过卢格结识的，马克思不仅十分欣赏他的才能，而且特别看重他对人类解放事业的天才的洞察力，而海涅尊重马克思不单因为他是一位具有钢铁般意志的革命者，而且认为他在艺术方面也有着非凡的才情。因此，海涅和马克思之间以至扩展到两个家庭之间都保持着亲密的交往。此外，被马克思说成是法国最优秀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蒲鲁东也是一样，他在居住巴黎时期经常和马克思会晤并彼此就黑格尔哲学展开“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关系由此特别密切；民主主义者海尔维格在1844年的3月到5月间与马克思也建立了友谊关系；至于在马克思眼里是德国最优秀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巴枯宁，在1844年的秋、冬季也与马克思经常会晤。^①

^① 长期以来被视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面而受到全盘否定的巴枯宁，其实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黑格尔分子”。在理论工作中他不断地寻求着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辩证法与生活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对辩证法的论述中注入了很多谴责妥协主义的激情，这也给1844年的马克思以非常深刻的印象。